

# 社会、个体比较中的老年人口 生活满意度研究

李建新 骆为祥

**【摘要】** 文章利用 2005 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考察参照标准的选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意义。研究发现,老年人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条件时,不仅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自身以前的状况相比或与自己的理想状况相比),更以横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周围的人相比),横向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关键词】** 社会比较 个体比较 老年人口 生活满意度

**【作者】**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骆为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朗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生活状况、生活质量及生活满意度也日益引起政府和学者的关注。随着诸多相关调查数据的应用和研究方法的成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迄今为止,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个体微观与社会宏观两个层次,而这些研究均可纳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Palmore 等,1972;George 等,1985;Riddick,1985;Lee,1978;Lee 等,1987、1989;Silverstein 等,1996;崔丽娟、李虹,1997;李建新,1997、2004;雍爱琳等,2001;熊跃根,1999;同钰莹,2000;张文娟、李树苗,2005;Fernandez 等,1981)。马斯洛(1996)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类具有生理、安全、爱、尊重、自我实现等 5 个层次的需要,而老年人生活质量高低、生活满意度都与这些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直接相关。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再沿用上述传统的分析框架。受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参照群体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萨米尔·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有关研究的启发,本文将从参照群体和相对比较的视角出发,在个体纵向比较与群体横向比较中,考察研究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满意度。

## 一、研究设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者斯托弗在美军中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对美国陆军士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Stouffer 等,1949)。斯托弗的研究验证了参照群体理论及相对比较对生活满意评价的重要性,其实证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在于,人们在评估自己的生活状况时,不仅以纵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自身以前的状况或自己的理想状况相比,生活条件是否令人满意),更以横向比较的方式进行(即与周围的人相比,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否让人满意)。在任何

一个社会的时空之中,每个个体都会从两个不同方向或不同维度进行比较:通常人们在对自身生活状况进行评价时,不仅受自己生活条件本身的影响——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还受到周围他人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否比别人好。如果处在相对较好的地位,则会有相对优越感,易产生满足感;反之亦然。目前运用参照群体和相对比较视角来分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换句话说,既有这一领域的研究囿于绝对的、客观的视角为多,而运用相对的、动态的视角为少。

本文将引入纵向的个体比较(过去—实际—理想)和横向的社会比较(与他人对比)的分析视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

##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利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项目跟踪数据中的2005年调查数据。老龄人口的样本数为15636个。在本文的分析模型中,最终纳入分析模型的变量为10多个,除去变量中不合理回答的样本,进入模型运行的样本数为12494个,占总样本数的80%。

本项研究关心的是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个体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雍爱琳等,2001;曾毅、顾大男,2002)。因此,在本研究模型中,因变量为现状评价中的生活主观自评变量即“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在本次抽样调查中,对自身生活现状评价“好”、“一般”和“不好”的百分比分别是61.96%、31.66%和6.39%。

本文所研究的是社会和个体比较中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即参照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里有两个参照比较的方面:一个是与他人的比较(社会比较)维度,另一个是与自己过去、与理想的比较维度。在本项研究中,与自己以往状况比较的个体比较变量中,信息有限,只有健康状况比较的一项,即“过去一年来您觉得您的健康状况有没有改变?”,回答归为三类:“变好了、没变、变差了”。与自己理想状况的比较只有生活状况的比较,即“您所有的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回答归为两类:“够用、不够用”。显然,用“生活来源是否够用”来衡量“与自己理想状况的比较”有些牵强,带有“需求—满足”的意味,但是考虑到中国生活水平已超过了温饱的界限,因此,这样一个衡量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人生活来源与自己理想状况之间差距的。前者三分类的比例分别为:10.93%、50.46%和38.60%,后者两分类的比例分别为79.17%、20.83%。有关与他人比较的社会比较变量通过以下问题表达,即“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什么水平?”,这个问题将个体生活的评价置于周围他人的比较之中,当地周围的人构成了所谓的参照群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三类:“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困难”,其比例分别为15.67%、67.10%、17.22%。虽然,纵向比较不只是健康状况、生活状况的比较,横向比较也不只是富裕程度的比较,但受调查数据的限制,本项研究自变量的选择也只能如此。

本文把社会人口特征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纳入分析模型,这些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以往的职业等。在本项研究分析的老龄人群中,最小年龄为65岁,最高为119岁,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64.22%;老年人口男性为44.88%,女性为55.12%;有33.66%的老人有配偶且与老伴共同居住,大多数老人(64.27%)的配偶已经去世;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普遍很低,文盲占了多数(62.99%),初中以上的仅10.17%;有75.28%的老年人曾是农民或工人,10.17%曾是干部,14.55%曾为其他职业。居住方式变量中,有83.75%与家人同住,有13.81%的老人独居,只有2.43%住在养老机构。

本研究模型还将考察客观健康控制变量。以往的一些研究表明,肌体健康会直接影响日常生活质量从而影响主观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在本文的分析中,肌体健康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过去患有重病和患有慢性病等方面来测量。依据调查数据,与这三个方面相关的个体身体健康指标如洗澡、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能力,曾患过重病和患有各种老年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关节炎等都将纳入下面的分析模型中。在模型分析中,我们将反映日常生活能力(ADL)的变量综合成一个二分类的变量,即日常生活完全自理和一项及以上功能缺损。在老龄人群中,79.74%的老人日常生活能够完全自理;有80.49%的老人在过去两年中未曾患过重病;在各种老年慢性病中,高血压、心脏病、哮喘病、白内障、关节炎等疾病比较常见。同样,在分析中我们也将上述各种老年慢性疾病综合成为一个三分类变量,即没有患过任何老年慢性病(为参照组)、患过其中一种和患过其中两种及以上,其百分比分别为52.98%、30.02%和17.00%。

由于因变量是分类变量且答案包含着好坏的顺序(好、一般、不好),本文采用对传统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改进了的Stereotype Ordered回归模型。该模型允许变量的系数在因变量不同类别之间保持差异,是一个较灵活且实用的模型<sup>①</sup>。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定义的是 $0 = \Phi_1 < \Phi_2 < \dots < \Phi_k = 1$ ,0和1分别对应着生活现状满意度的“不好”到“好”。在此设定下,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正就表示具有这个特征的老人更倾向于对生活满意度有较好的、积极的评价,或者说,这个因素比照参考组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影响,如果系数为负,则表示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消极的影响。

### 三、结果分析

#### (一) 个体比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1列出了个体比较中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包括了代表个体比较维度的两个变量,即老年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前后比较、实际生活状况与理想生活状况的比较。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较之于与去年相比健康状况变差的老人,健康保持不变的老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而健康状况变好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上更积极,这在回归系数和统计相关性上都能得到反映。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生活来源够用的老年人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不够用的老年人高出13.60倍。

模型2控制了老年人的个性特征,即“不论遇到什么事您是不是都能想得开?”。个性特征变量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变量,个性特征不仅对个体比较产生影响,而且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个性开朗的老年人倾向于报告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也会做出乐观的自我比较,因此,模型1有可能高估个体比较变量的作用。模型2的计算结果显示,一方面,性格开朗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要显著高于性格不太开朗的老年人;另一方面,加入个性特征变量后,个体比较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下降,这一点可以从 $\Phi$ 值和回归系数变小得到反映。不过,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个体比较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得到的。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职业、收入)、社会人口学(年龄、性别、婚姻、居住安排)变量影响着个体比较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模型3的结果显示,无论是 $\Phi$ 值还是个体比较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就个体健康状况的比较而言,健康改善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

<sup>①</sup> 模型具体介绍参见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

表1 个体比较中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hi_1$	0	0	0	0
$\Phi_2$	0.585***	0.563***	0.543***	0.542***
$\Phi_3$	1	1	1	1
与去年相比健康不变(变差=0)	1.354***	1.067***	1.118***	1.101***
与去年相比健康变好	2.315***	2.037***	2.105***	2.088***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否=0)	2.681***	2.499***	2.370***	2.360***
个性一般(不开朗=0)		0.328*	0.276*	0.272+
个性开朗		1.927***	1.871***	1.864***
年龄			0.014***	0.013***
性别(女性=0)			-0.180*	-0.192*
丧偶(其他=0)			0.262	0.256
有配偶并一起居住			0.154	0.153
受教育1~5年(0教育年限=0)			-0.049	-0.038
受教育6年及以上			0.062	0.069
工人或农民(其他职业=0)			-0.173+	-0.172+
专业性的或政府工作人员			0.371*	0.376*
生活来源来自子女(其他=0)			0.465***	0.466***
生活来源来自退休金			0.391***	0.412***
与家人居住(独居=0)			0.957***	0.947***
养老院			1.910***	1.905***
日常功能是否完好(否=0)				-0.069
是否患过重病(是=0)				-0.045
只患过某一种慢性病(否=0)				-0.030
患过两种及以上慢性病				-0.237*
LR chi <sup>2</sup>	1975.69***	2790.01***	2680.24***	2686.82***
Df	4	6	18	22
$\Delta$ LR	1975.69***	477.28***	227.27***	6.58

注：n=12494；\*\*\* p<0.001，\*\* p<0.01，\* p<0.05，+p<0.10。

积极影响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影响的程度有所增加。相对于那些与去年相比健康状况变差的老人,健康状况保持不变的老人报告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略有提高(回归系数由原来的1.067增至1.118),健康状况变好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情况类似(回归系数由原来的2.037增至2.105)。至于个体生活状况的比较,生活来源是否够用依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影响程度略有减小。模型3中, $\Phi$ 值和个体比较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化,显示了这组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

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以后,可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负担(如生活照料、医疗费用等),从而有助于代际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改善意味着活动能力的增加,老年人可以扩大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增加一些日常的娱乐活动,从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水平。为了比较自评健康和客观健康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作用的大小,我们在模型3中纳入了客观健康变量(包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过去患有重病和患有慢性病)形成模型4。模型4结果显示,客观健康变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模型的解释能力(客观健康变量联合假设检验不显著, sig. =0.1598>0.05)。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模型中自评健康即“过去一年来您觉得您的健康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健康状况,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也就代表了客观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

当然,客观健康状况并不完全等同于自评健康。即使在上述模型中有自评健康变量,客观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水平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就老年人患某种慢性病而言,患各种老年病越多,其生活满意度越低。其中,患有某一种疾病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和不满意之比是没有患病老年人的 97%,患有两种以上疾病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和不满意之比是没有患病老年人的 79%。不过,老年人的日常功能状况、近两年是否患过重病并没有统计意义上显著差异。总的来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客观健康变量影响程度不如自评健康是否改善那么突出。

**(二) 社会比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基本上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逐渐回归家庭,业缘、地缘关系萎缩,参照群体的规模大幅度减小,但社会比较变量依然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表 2 提供了社会比较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模型的分析结果。

表 2 模型 5 的计算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的相对位置越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

**表 2 社会比较中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Phi_1$	0	0	0	0	0
$\Phi_2$	0.644***	0.609***	0.586***	0.583***	0.565***
$\Phi_3$	1	1	1	1	1
与去年相比健康不变(变差=0)					1.063***
与去年相比健康变好					2.009***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否=0)					1.278***
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中(居差=0)	3.160***	2.945***	2.884***	2.857***	2.145***
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高	7.015***	6.350***	6.090***	6.043***	5.000***
性格一般(不开朗=0)		0.466***	0.430**	0.399**	0.252+
性格开朗		2.184***	2.173***	2.113***	1.760***
年龄			0.014***	0.013***	0.015***
性别(女性=0)			-0.220*	-0.255**	-0.214*
丧偶(其他=0)			0.185	0.181	0.164
有配偶并一起居住			0.096	0.109	0.094
受教育 1~5 年(0 教育年限=0)			-0.094	-0.074	-0.123
受教育 6 年及以上			-0.117	-0.096	-0.124
工人或农民(其他职业=0)			-0.135	-0.155	-0.157
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			0.190	0.198	0.194
生活来源来自子女(其他=0)			0.224*	0.238*	0.246*
生活来源来自退休金			0.201	0.287*	0.132
与家人居住(独居=0)			0.751***	0.747***	0.780***
养老院			2.022***	2.038***	1.964***
日常功能是否完好(否=0)				-0.020	-0.135
是否患过重病(是=0)				0.186*	0.008
只患过某一种慢性病(否=0)				-0.143+	-0.040
患过两种及以上慢性病				-0.467***	-0.224*
LR $\chi^2$	2419.15***	2948.66***	3097.71***	3126.10***	3612.38***
Df	3	5	17	21	24
$\Delta$ LR	2419.15***	529.52***	149.04***	28.39***	486.28***

注: n=12 494; \*\*\* p<0.001, \*\* p<0.01, \* p<0.05, +p<0.10。

相对于那些与他人相比生活比较困难的,生活水平居中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而生活比较富裕的较之生活水平居中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上更积极。即使我们控制了老年人的个性特征变量,生活水平的相对状况仍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很大影响(见模型6)。与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相比,生活水平居中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与不满意之比提高了18倍,生活比较富裕的老人生活满意与不满意之比更是提高了571倍多。

控制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以后(模型7),社会比较变量对老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减弱:较之于生活比较困难的老人,生活水平一般的老年人报告生活好的OR值减少了5.92%;生活比较富裕的老年人报告生活好的OR值减少了22.89%。可能的解释是,教育、职业部分分担了社会比较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受教育程度与个人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密切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长,职业层次越高,生活水平的相对位置也就越高,从而“分担”了社会比较变量的影响。与从事其他职业的老人相比,从事专业性和管理性工作的老人不仅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经济收入,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工人和农民则不享有这样的优势。既然教育状况、职业地位、收入来源等与生活水平的自我排序高度相关,自然会影响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在没有健康自评的情况下,模型8中加入客观健康变量,结果显示客观健康变量能够显著增加模型的解释力。未曾患过重病的老年人相对于患过重病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要高一些;患各种老年病越少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不过,对比模型4中自评健康是否改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影响,肌体健康的作用程度要小得多。其实,对于老年人而言,患某种慢性病、日常功能存在障碍或曾经患过重病乃至生理机能退化的表现,实属正常现象,周围的老人也是如此,因此不会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 (三) 社会比较、个体比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诚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社会比较、个体比较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方面意义重大,但社会比较和个体比较何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呢?为了综合考察社会比较、个体比较维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将社会比较、个体比较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见表2模型9)。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相对位置越高,个体身体状况改善,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越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尽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社会比较、个体比较变量的作用有所减小,但是两个维度的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始终有着显著的影响(见表3)。

老人生活满意度水平不仅受自我比较的影响,也受社会比较的影响;老年人的自身比较、社会比较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但两者间存在交叉、彼此影响。或许可以说,个体比较中的“与自己过去状况的比较”与社会比较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与自己理想状况的比较”很大部分来自自己认同的优势群体。个体理想的生活状况或多或少掺杂社会比较的成分,如“白领”阶层期

表3 社会、个体比较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OR值

变 量	模型4		模型8		模型9	
	好/不好	一般/不好	好/不好	一般/不好	好/不好	一般/不好
与去年相比健康不变(变差=0)	3.01	1.82			2.90	1.82
与去年相比健康变好	8.07	3.10			7.46	3.11
生活来源是否够用(否=0)	10.59	3.59			3.59	2.06
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中(居差=0)			17.41	5.29	8.50	3.36
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高			421.16	33.89	148.41	16.86

望与贫困地区的农民相比,因为其消费水准不同,使得他们理想的生活状况存在差异。具体来说,生活来源是否够用,不仅是能否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问题,还有着能够达到与自己的参照对象同等的生活水平的问题。如果个体觉得自己的生活相对比较富裕,那往往会做出生活来源够用的判断;反之,则会做出生活来源不够用的判断。

通过比较模型 4、模型 8、模型 9,可以找到理想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比较相关的证据。模型 4 引入社会比较变量后,前后健康比较的回归系数变动幅度很小,而生活来源是否够用的回归系数减少了 45.85%,OR 值减少了 66.10%。模型 8 在引入个体比较变量时,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中的回归系数下降了 24.92%,OR 值减小了 51.18%;与他人相比生活水平居高的回归系数减少了 17.26%,OR 值则减少了 64.76%。可见,生活来源是否够用、与他人相比的生活水平间存在着“交集”,这一“交集”使得它们彼此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的独立影响下降。

此外,表 3 还列出了个体比较和社会比较变量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一般与不好的 OR 值,这也正是 Stereotype Ordered 回归模型较之于传统 Ordered 回归模型除假设条件弱外,还能提供更多信息的优势之处。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 (四) 控制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社会人口特征来看,年龄因素影响生活满意度自评。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Campbell,1976;李建新,2004;Zhou 等,2007)。学者普遍认为,健康选择性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生活乐观、生活满意度高的老人更容易存活下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经历疾病困扰、亲朋过世、经济危机等事件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健康选择性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其实,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人会有那种经历世事的满足感和拥有丰富经验的自豪感;相对于过去来说,老年人会发现如今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会有生活改善的满足感;相对于周围的同龄人来说,老人会发现他们也经历与自己一样的危机、困苦,而且他们会有一种“存活”的庆幸。因此,有学者发现年龄越大的老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变得更加幸福(Campbell,1976)。所以,不仅仅是健康选择性,可能还有相对比较的因素存在。

从性别来看,不同性别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别,男性老人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老人低出 19.27%。男性老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迅速缩小,更容易感到孤独、寂寞;而女性传统上主要以家庭为主,年龄增长对其关系网络的规模影响不大,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因此女性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George 等,1985)。婚姻状况没有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晚年时配偶可以提供最可靠的心理支持、周到的生活照料(同钰莹,2000);而且婚姻可以是自我实现的表现,有助提高老人的自尊(Lee 等,1989),因此,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老人理应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然而我们研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虽然回归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对于这些高龄人群,照料配偶的负担抵消了彼此相依带来的生活满足。如果老人(特别是高龄)配偶健在的话,配偶存在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极大,需要其提供生活上的照料,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sup>①</sup>。随着年龄逐步增高,老人的配偶去世也是在所难免,因此,高龄老人丧偶比较普遍,在我们研究的群体中,丧偶的比例高达 63%。可以看到,丧偶并不会给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自评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丧偶后仍能感受到婚姻的支持作用,但却没有了照料老伴的负担和感受老伴病痛的痛苦。

<sup>①</sup> 调查问卷中并无老年人配偶的健康信息,不能做进一步分析。

如果老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不需要依靠子女经济上的供养;子女更多地承担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对双方而言,养老都将变得轻松、愉快。即使子女不养老,老年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收入换来生活上的照料,从而降低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陈彩霞,2000)。然而,我们研究发现并非靠退休金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最高,而是那些主要靠子女供养的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子女的经济支持有着双重功能:一是缓解老人的经济压力,改善老人的生活状况;子女的经济支持也传递着对老人的关心、孝敬(李建新等,1997;张文娟、李树苗,2005);二是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子女在自己老年时提供生活来源会觉得人生的意义得到了实现,付出得到了回报,自己教子有方,会觉得非常有“面子”。因此生活来源主要靠子女的老人表现出最高的生活满意度。

目前中国养老机构里的老年人大部分是“五保户”、身边没有子女或身边有子女却无暇给予照顾的老人(Chen,1996)。2002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在机构养老的65岁及以上老人中,50%为无子女老人,30%有存活子女但不居住在附近(城镇这一比例达40%以上),20%有子女居住在附近但可能因子女无暇顾及而只好依赖机构养老(顾大男、柳玉芝,2006)。尽管养老机构的老人缺乏子女的照顾,但他们更倾向于报告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家人共同居住的老人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独居的老人高出1.18倍;而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报告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要比独居的老人高出6.13倍。有学者认为,一些经济收入高的、生活自理能力好的城镇老人住养老机构可以调节生活、躲避与子女间的家庭矛盾,所以养老机构老人生活满意度高(顾大男、柳玉芝,2006),但这不是普遍现象;还有学者认为,养老机构老人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好地交流(Zhou等,2007)。不过,笔者认为,老年人彼此的沟通、共同的兴趣固然很重要,但前面的论述表明,生活来源主要靠政府并不是他们理想的生活来源,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大多没有孩子、没有子女的照顾,相对“同质”和“稳定”,不至于像许多独居老人有儿女却得不到关怀而形成大的心理落差。

#### 四、小 结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仅取决于自身状况的改善,也取决于自己期望的达成,还取决于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地位。固然客观的状况,譬如肌体健康、经济收入等,对老年人生活满意产生影响,但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的、心理健康的指标,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或现在的处境与本人生活期望或某一外在的标准进行对比时所作的评价。也就是说,老年人评价自己的生活条件时,很大程度上是在个体比较、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我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优于他人的生活水平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虽然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无论是业缘网络还是朋友圈子缩小,参照对象规模大为减小,但丝毫没有降低优于他人的生活条件给老年人带来的生活满足。

此外,我们看到比较的视角在解释年龄、婚姻、生活来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方面的意义。年龄本身附带的相对于年轻人、过去、周围人的优势,使得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尽管健康、生活等压力日渐加大。不同婚姻状况的老人生活满意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在于高龄老人配偶去世乃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会给老年人生活带来太大的危害。我们不排除机构养老有助于老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但鉴于中国的养老政策,养老院的老人大多是无子女的老人,他们缺乏子女的照料却表现出最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需求—满足”的逻辑可以纳入到比较的视角下来分析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论从情感的获得、经济的支持还是到生活的照料,老年人都希望自己相对得到更多,都希望自己的于他人。总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虽然这种比较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如职业、教育、收入等)的影响。

#### 参考文献:

1. 陈彩霞(2000):《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人口研究》,第2期。
2. 崔丽娟、李虹(1997):《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研究》,《心理科学》,第2期。
3. 顾大男、柳玉芝(2006):《中国机构养老老人与居家养老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比较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4. 李建新(2004):《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增刊)。
5. 李建新(2007):《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人口研究》,第3期。
6. 李建新、张风雨(1999):《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7. 马斯洛等(1996):《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
8. 同钰莹(2000):《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口学刊》,第4期。
9. 熊跃根(1999):《我国城市居家老年人晚年生活满意度研究》,《人口与经济》,第4期。
10. 雍爱琳等(2001):《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增刊)。
11. 曾毅、顾大男(2002):《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12. 张文娟、李树苗(2005):《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13. Campbell Angus(1976),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31:117-124.
14. Chen S. (1996), *Social Policy of the Economic State and Community Care in Chinese Cultur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5. Fernandez, Roberto M. & Kulik Jane C. (1981), A Multilevel Model of Life Satisfaction;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ighborhood Compo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840-850.
16. George, Linda K., Okun, Morris A. & Landerman Richard(1985), Age as a Moderator of the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ing On Aging* 7:209-233.
17. Lee, Gary R. (1978), Marriage and Morale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0:131-139.
18. Lee, Gary R. & Ishii-Kuntz Masako(1987), Social Interaction, Lonelines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Researching On Aging* 9:459-482.
19. Lee, Gary R. & Shehan, Constance L. (1989),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elf-Esteem of Older Persons. *Researching On Aging* 11:427-442.
20. Palmore Erdman & Luikart Clark(1972), Health and 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2:68-80.
21. Riddick, Carol Cutler(1985), Life Satisfaction Determinants of Older Males and Females. *Leisure Sciences* 7:47-63.
22. Stouffer, Samuel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 Silverstein Merril, Chen Xuan & Heller Kenneth(1996),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970-982.
24. Zhou, Min and Zhenchao Qian(2007),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Oldest Old. In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Edited by Zeng Yi, Dudley Posten, Denese A. Vlosky, and Danan Gu. Springer.

(责任编辑:朱犁)

a contribution of 17.67% to it; (3) the influences of human capital on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regions and within regions are different; (4) the difference of investment among regions mainly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margina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5) sinc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FP has becom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nlarg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 Flow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Chuanjiang, Dong Yanfang* • 50 •

Human capital is heterogeneous, and its flow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oth inflow and outflow areas, and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whole region consisting of such area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heterogeneity in human capital, this article combines mode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to test the propositions, and argues that speeding up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achieved by controlling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 flow.

**An Indirect Estimation Method for the Quantity of Only Child**

*Yang Shuzhang, Wang Guangzhou* • 58 •

Based on examining the specific definitions of only one chi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mothers with only one child. By following the basic idea and methods of parity progress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to estimate only one child probability of the first child family by fertility rate and birth interval. As an application example of indirectly estimating method to the quantity of only child, we have estimated the quantity of only child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07.

**Social Comparison, Self-comparis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Chinese Elderly**

*Li Jianxin, Luo Weixiang* • 65 •

Previous studie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mainly focused on whether their needs had been met, bu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nterpretations of comparison. Using the fourth wave of the CLHLS in 2005,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etations of comparis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rating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the elderly compared their present living conditions not only with their previous and ideal status (referred to as self-comparison or vertical comparison), but also with others' in their local areas (referred to as social comparison or horizontal comparison). To a large extent, self-rated life satisfaction depends on the result of social comparison.

**China's New Public Pension System and Social Pool Benefits and Individual Account Principal**

*Yang Zaigui* • 74 •

Employing an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ribution way of China's partially funded public pension system revised in 2005. It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firm contribution rate,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rate,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the life expectancy on the capital-labor ratio, the social pool benefits and the individual account principal.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The increase in the firm contribution rate decreases the labor-capital ratio and the individual account principal, while increases the social pool benefits; The increase in th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rate increases the individual account principal; both the fall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the rise in the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 the labor-capital ratio and the individual account principal, while decrease the social pool benefits.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Dropout Rate: Evidence from Yunnan Province**

*Gao Mengtao, He Yun* • 80 •

Using a sample of 1422 households in poor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dropout rate of children's schooling.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the size of the school and affluence of teache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cidence of breaking children's school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charge of classes can enhance the education continuing at fundamental education stage, and there exists the gender gap on the probability of children discontinuing schooling.

**Position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Status and Collective Consump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Countrysi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enzhen**

*Zhou Lingang* • 88 •

From the collective consumption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 Sociology, the essay classifies collective consumption goods, analyse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s among migrant workers from countryside, and explains its affecting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survey data of Shenzhen. The result shows: position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status and dual structur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Shenzhen Specialized Economic Zone) are the main variables restricting the collective consumption of this group;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m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production field but also in the collective consumption field.